

■知无不言

“浮盈也算盈” 一石两鸟

——谈谈本次金融危机的美国政府因素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现已形成的共识是，美国之所以成为这次危机的发源地，是因为其不受节制的贷款消费以及负债。但这首先该归于政府开支扩张而需要的税收加重，其次是美国人不想降低生活水准。当储蓄花光时，就只剩下借款消费了。

为了能够使政府和个人有钱可借，维持虚假繁荣，政府只有不断增加货币发行。美元1971年与黄金完全脱钩后，美联储增加货币发行的最后障碍被拆除了，美元变成了纯粹由美国政府控制的纸币。正如美国有识之士所总结的，美国政府通过操纵和压低物价指数，尤其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所谓核心CPI，可说是随意扩张货币发行铺平了道路。38年来，美国有的只是通货膨胀，而没有通货紧缩。黄金价格上涨了30倍，就是无可辩驳的明证。

经济学教科书上说，是经济增长导致了货币发行增加，是物价整体上涨导致了通货膨胀。但现实和逻辑都显示，从来都是货币发行过多导致了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导致了物价整体上涨。如果不是货币发行过多，则只能是经济越增长，物价越便宜，而非相反。

可见，美国政府通过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不受约束地过多发行纸币，为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才使得私人实体能够低成本轻易借贷，不加节制地消费；即使没有储蓄支撑，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也能够泛起越来越大的泡沫，直到破裂。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操纵会计制度，保持了虚假收益的延续，并使其变为实实在在可供政府开支的税收。正因为不同的会计制度对于成本与收益的确认原则不同，所以，要想使虚假膨胀或泡沫经济能够延续，就离不开对会计财务制度的操纵。这样会计原本只是一种据实记录的管理工具，不知从哪天起也沦为了美国政府的操纵手段。特别在实行了“按市值计价与确认收益”的会计制度后，短期投机意图和行为的高涨就一直鼓舞着政府与各类企业的控制者。这一制度不仅将已实现盈利作为收入，也将那些仅仅停留在账面上的虚假浮盈列为收益——所谓“浮盈也算盈，浮亏算亏损”。

此前的会计制度“浮盈不算盈，浮亏算亏损”，还能敦促着人们追求已实现的收益，约束着人们的投机行为，使投资相对保守。因为再大的浮盈也不被计入入账，而浮亏则确确实实地减少利润，所以，人们不仅不会追求过大的虚假账面盈利，还会尽量避免浮亏。但这一制度不能将账面浮盈作为纳税所得来增加政府税收，不利于资产市场的持续膨胀，也就不利于维持虚假繁荣。当然不会是报喜不报忧并热衷于扩张的政府所偏好的制度。

只有“浮盈也算盈”的会计制度，才会一石两鸟。首先，只有“浮盈也算盈”，政府才能将账面浮盈也计入应税所得额，尽管市场实体没有兑现盈利，但政府却将实实在在的税纳入了国库，成了可以使用的财政开支。其次，“浮盈也算盈”，才能将账面浮盈计入企业控制者的业绩，而只有资产市值的不断提高，才能确保浮盈不断增长。所以，这一会计制度不仅不会导致人们急于兑现浮盈而抛售资产，反而想方设法去促销市值上涨。这当然就能保证虚假膨胀和繁荣的延续，甚至进一步高涨。

问题是，在期权和选票作为现代企业和政府控制者回报的年代，如此会计制度，首先会使企业经营管理层为了自身的期权价值最大化而不惜动用一切合法、不合法手段去不断提高所掌控企业的市值，却全然不顾股东们的利益得失。为片面追求资产扩张和市值上涨，那些原本属于生产性的制造业或采掘业企业，也会不断贸然深入到房地产业和金融资产市场，甚至将生产性业务彻底抛弃；金融企业更是采取所有可能想到的手段去膨胀资产，尤其是通过不断加大使用财务杠杆的衍生产品虚增市值，为此不惜铤而走险大肆做假账。而政府控制者则从这种虚假膨胀中维持并增加了选票，获得了切实的财政和政治实惠。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

由此，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家庭和个人，都在行为上变得越来越短期化，也越来越投机，整个社会也就越来越浮躁和虚荣。包括最普通人群在内的整个社会均将房屋净值（房屋市值减去首付与贷款成本后的所谓增值）与股票增值作为储蓄和财富，然后在此基础大肆借贷消费，寅吃卯粮。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些资产市值增值毕竟不是储蓄，以此为基础的消费，只能是借台高筑，不可持续，危机的暴发和经济严重衰退不可避免，等待人们的只能是一场经济灾难。

至少在这次危机起源地的美国，货币和会计制度是造成先前虚假膨胀的首要因素，从而也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而无论是货币制度还是会计制度，哪个不是由美国政府垄断和掌控的呢？目前的货币制度与会计制度，正是美国政府无限扩张和市场自由日渐受制的体现。

还是美国人自己的总结更加真切：如同健全货币一样，美国的经济自由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低税率、最低程度的经济干预和高储蓄也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美国以前的政府限制和自由经济的比较优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看来，什么是救助经济衰退和减缓危机深化的真正有效思想与行为？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答案只能是：回到健全货币和有限政府的宪政轨道上来，并实现可行性经济的重建。”



历史上，除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外，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能源过剩，各国对开发新能源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甚至停滞后退。本次危机并非石油危机，但各国却把新能源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新能源的投入呈现加速之势。因为，发展新能源在今天已成了欧美低碳经济争霸的手段，成了欧美摆脱经济困境的主要途径。

为了提高自身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格局之中获得相对有利的位势，也为了顺应国际潮流，缓解环境压力，我国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控制规则的制订与新能源技术的开发，而应对来自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中国需要循环经济与新能源经济双轮驱动。

■思想

全球低碳经济争霸已然开赛

——循环经济随笔之二十三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
发展战略处处长

前不久，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如果我们再不重视新能源发展，不从更高的视野审视新能源发展问题，预计再过十年，将会突然发现，我们又落到别人后面了。

到时候，即使想追也追不上了！我国内能源部门最高领导，在重大场合，作如此郑重的表态，许多人不免有些困惑：是不是有人在反对发展新能源？还是这些年我国的新能源发展速度太慢了？！

事实并非如此，甚至与上述担心几乎完全相反：并没有人反对我国发展新能源，不少笔者从公开媒体中没有发现：我国这些年新能源发展不仅不慢，而且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比如，我国风能已连续几年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8年，在全球快速增长的风能新增装机量中，接近三分之二发生在亚洲，而亚洲超过七成的新增装机量又都在中国。核能的情况也类似，如果2008年世界核能发展可以继续用“快速发展”来描述，中国核电项目新开工进度就只能用“爆炸式发展”来形容了。

对国家能源局长的这番讲话，笔者认为，需要从国际能源的大环境变化上去理解。今天，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危机之中，而这次危机与一般金融或经济危机有着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危机后各国政府的能源政策：

历史上，除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外，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能源过剩，

各国对开发新能源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甚至停滞后退，本次危机并非石油危机，但各国却把新能源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新能源的投入呈现加速之势。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发展新能源已成了欧美低碳经济争霸的手段，成了欧美摆脱经济困境的主要途径。

早在本世纪初，欧盟就开始打着防止地球气温变暖的旗号，大力推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进程，作为其扩大在国际事务中主导地位的博弈手段。在经济领域，他们则提出了低碳经济作为配套。英国在2003年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是指通过较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从表面看，低碳经济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实质是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变革，是从化石燃料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一次大跨越。为此，欧盟各国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大量投入，其相关产业化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其相对优势，欧盟大力推进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进程。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这必将左右全球经济的总规模。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从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分庭抗礼。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立在欧洲，欧盟已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

在美国，受集团利益的制约，前几年布什政府在全球气候控制方面一直持消极态度，因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美国饱受国际社会的指责。但是，奥巴马政府的态度出现了180度大转弯，强调发展新能源、减少温室气体的责任和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环境政策随着政府更替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固然与奥巴马个人认识与理念有关，更主要还是迎合了应对来自欧盟在低碳经济领域咄咄逼人挑战的需要。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唯一永恒的标准”。在节能减排的背后，实际上是巨大的经济得失和国际地位的更迭，而这才是驱动大国在低碳经济博弈的动力。另外，美国能源新政还有个“不便公开的秘密”，即抑制传统能源价格上涨，直接打击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利益。前几年的油价大涨，为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这些美国看不顺眼的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并成为他们在诸多领域挑战美国的资本。为此，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

除了作为国际争霸的手段之外，发展新能源还成为西方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途径。奥巴马自参选之日起就把新能源作为振兴经济的着力点。借助能源新政的指引，奥巴马政府希望极大地促进美国经济转型，实现从消费社会向生产社会的转变，每年能有上万亿美元的资源产品和消费品的进口需求能够为内需替代所解决。这不仅会创造一个全新的能源产业，而且将增加500万就业岗位，扭转美国经济危机的窘迫局面。如果说IT产业昨天曾将

美国送达全球力量顶峰，那么未来可以将美国送达世界经济制高点的产业可能就是新能源产业了。而欧盟，作为一个成熟和超稳定的经济体，人口稳中有降，基础设施已完善，经济外延扩张的物理空间十分有限，所以本世纪初就将新能源产业发展选定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美国对发展新能源态度的逆转，更加让欧盟坚定了此前的选择。

与美欧相比，我国发展新能源的动机具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发展新能源并非是参与国家争霸；其次，相对而言，新能源对经济的拉动力太小，如果将摆脱经济危机困境的希望寄托其上，时间将遥遥无期。我国发展新能源，根本是从国际视野着眼，为了提高自身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格局之中获得相对有利的位势，同时也顺应国际潮流，缓解环境压力，为全球气候控制作贡献。从国内发展看，可以减少对传统石化能源的依赖，增强能源供给安全，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通过加快核准和开工建设一批影响重大的能源项目，也可以为扩内需做出一定的贡献。

对我国来说，一方面要像欧美国家一样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控制规则的制订与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另一方面，正如本栏前几篇再三提到的，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由此带来的低碳经济竞争力的提高程度，可能远非新能源技术提高所带的幅度可以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对来自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中国需要循环经济与新能源经济双轮驱动。

为了反腐，中国政府想了办法。据4月27日新华网报道，今年2月27日甘肃省预防腐败局挂牌。该局被认为是全国首个省级预防腐败局，既然是“首个”，想必各省会陆续成立，而成立预防腐败局对反腐的效果还有待检验。实际上，最好的反腐办法是让财政透明并受到有力监督，因为腐败的目的不过是为钱财，财政透明之后腐败就不容易了，至少是腐败成本大幅提升。从实际效果来说，或许它比成立预防腐败局更有效，因为它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而不是简单地加强查处力度。

因此，财政透明不仅是政府履行保障公民对财政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要求，也是反腐败的利器。据蒋洪教授项目组的研究，日本大阪府、美国纽约州等地的政府财政信息非常细致，比如日本，细致到具体单位的一把手招待费有多少，在哪里用餐、跟什么人用餐、吃的东西都一一列出”。当财政透明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任何猫腻都已经不可能存在，或者说就能让所有可能的贪污腐败都暴露在阳光下。

从历史经验来看，财政不能透明化和阳光化，真正的理由可能是有利于腐败。财政透明化和阳光化，有利于反腐败。为了遏制腐败，必须使财政透明化和阳光化。

■江户物语

在“研修”的光鲜外衣下



◎陈鸿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编辑室主任

随着日本经济危机程度不断加重，失业率也在急剧攀升。今年3月就比2月提高了0.4个百分点，预计年内将会突破6%，创下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新高。在这股失业大潮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从周边国家招收的研修生。

日本的研修生制度始于1993年。其初衷是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通过在日本的研修实习，掌握一定的技术，回国后发挥作用。但日本同样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尤其是那些利润空间有限、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从这一制度中看到了吸收廉价劳动力的巨大空间，于是便上下配合，全力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表面上，日本的法律不允许企业直接接受外国研修生，必须通过一家叫做“国际研修合作机构”的中介组织，即由该机构代为办理各种手续，引进研修生，然后由该机构向企业派遣研修生，企业向中介缴纳“管理费”。中介组织名曰“管理”，其实也就是收钱。什么政府的规定，在他们眼里都是做样子的。尽管企业为此须缴纳每人每月3万至5万日元的费用，但由于付给研修生的费用仅为6万至7万日元，加起来还不到日本员工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说各种保险费用了。而且研修生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根本就不谈不上技术含量，都是很简单的工作。到了3年就换人，由此确保企业的劳动力不会发生问题。

2007年，日本吸收的外国研修生首次突破了10万人大关。他们被分到2.5万家中小企业。当初日本接收企业与这些研修生签订的合同期限是3年，但由于突然暴发的金融危机，企业订单骤然减少，当然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员工了。在裁减员工时，让外国研修生先卷铺盖走人，对企业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此举却使得众多的外国研修生窘迫万分。

过去，说起日本外籍工，大都是日裔巴西人，即日本在巴西移民的后代。但由于那些外籍工在日本的生存能力较强，所以跳槽频率很高，再加上由于他们拥有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其工资水平也不比日本人低，所以现今日本一些中小企业根本用不起这批人。

以爱知县一家电器零件生产企业为例。该企业拥有140名员工，年销售额约为20亿日元。前几年为了扩大生产，该企业想增加员工，4年中居然没招到1名本国员工。无奈之下，为了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转，便将眼光盯上了研修生。该企业的一位负责人专程前往越南招收研修生，前年和去年分别接受了9名和10名越南研修生。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转眼间订单锐减，企业都无法每天开工了，这近20个越南研修生就首先成了牺牲品。

这些越南研修生去日本就是为了挣钱，尽管他们在日本的“研修费”比同企业日本职工的工资低得多，但通过节衣缩食，3年下来还是可以积攒下一笔钱的。但越南研修生的出国费用相当高昂，他们为此向本国中介机构缴纳的费用就达1500美元，另外还须交付8000美元的保证金。这些费用他们大多都是从银行借贷的，为此每月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就与当地的月收入水平不相上下。对那些越南研修生来说，第一年是为别人打工，也就是偿还费用和支付利息，后两年才能略有节余。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忍受了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的宿舍摆满了—张张上下床，一个房间挤了近20人，几乎没有空间。日本人在那样的条件下就连一天也呆不下去。尽管专门为他们建有食堂，但为了节省伙食费，他们都自己做饭。吃够苦头倒也算了，因金融危机突然被提前辞退，从而完全打乱了计划，这实在让他们欲哭无泪。

为了解决研修生与所在企业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中介组织当然也要装门面，设立了包括汉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的热线电话。2007年，仅汉语热线电话就接到1434次投诉，越南语403次投诉，印尼语68次投诉。当然更多的研修生压根就不知道这些热线电话的号码，否则投诉肯定不止这点人次。实际上，就是接通了电话，甚至直接去该机构投诉，结果也就只能劝外国研修生和企业协商解决问题。以目前的形势而言，因遭到企业提前辞退，该机构理应为研修生另行物色可以接受的企业。但在目前的失业狂潮中，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该机构并非行政机关，不具有法律权限，所以实际结果就是研修生忍气吞声，黯然踏上回家的路程。

这几年急剧增加的外国研修生，让那些中介组织赚得钵满盆满。比如上述那家机构，2007年仅管理费收入就高达16亿日元，以至于它在各地的工作人员仅为117人，而在东京总部却有166人之多。在包括理事长在内的7名理事中，6人来自原政府部门，分别为法务省、外务省、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等，其年收入在3700万至5000万日元之间，这都要比日本的平均年薪高出好几倍。外国研修生的血汗养活了谁，不是一目了然么？

■财经别裁

财政透明之难



◎洪振快
历史学者
独立撰稿人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有什么需要掖着藏着，纳税人也

有权知道政府到底怎么花钱，所以财政理应透明化和阳光化，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教授的一个大会书面发言，却是“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今年两会，蒋洪教授公布他所做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调查报告结果，让人很失望：接受调查的30个省份中，算得上合格的只有一个省，大部分省份对本该公开的信息拒不公开。这委实让国人很纳闷：财政透明为什么这么难？

各省为什么不愿公开财政的细化信息？保密是一个理由，但这大概不会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看一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说“跑部进钱”。众所周知，“跑”是带“包”的，“这个包”不可能是地方官员个人掏腰包，

自然是地方财政埋单，假如财政透明，它就可能没有遁身之地，因为不可冠冕堂皇地摆上桌面，让人大、政协代表审查通过。财政不透明，实际上有利于有关人员操作。

明清两代，“部费”大行其道。各朝皇帝都厉行禁止，但实际上禁而不止，皇帝圣旨成了空文。“部费”为何盛行？雍正三年（1725）一位官员将之分析得很透彻：文武大臣“藉部费之名”筹得资金，但他们不可能将下剥削得来的钱全部上交，而是截留一部分归自己。而对于办理此类事务的“各衙门”，即“跑部进钱”之人，他们自然也不会白干事，他们通过“少报多”“多吃少报”的方式，可以获得诸多“差余”。

这样，最终是层层剥削、处处分食，相关的人都有好处。所以，“部费”之所以难以禁，根本的原因是“处处分食”，在“部费”的利益链条上，没有哪一个人愿意让其处于阳光之下。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情由”，从京城到地方，官员们势必对禁止“部费”的圣旨消极抵制，所

以此封“部费”一脉下去，最后是老